

重新理解马克思对抽象人性论的批判

王一涵

(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秦皇岛 066000)

[摘要]本文旨在超越将马克思对抽象人性论的批判简单归结为否定“人的本质”的传统解读,深入探究其批判的深层哲学意蕴与建构性维度。文章认为,马克思的批判核心在于一场方法论的根本革命,实现了从“静态抽象”到“历史生成”、从“内在规定”到“关系总和”、从“思辨起点”到“实践产物”的三重飞跃。这一批判不仅揭露了抽象人性论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特定历史条件永恒化的保守功能,同时也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地基上,建构起以“现实的人”及其“感性活动”为核心的新的人性观。

[关键词]马克思;抽象人性论;人的本质;实践;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作者简介]王一涵(2003—),男,河南平顶山人,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4024>

[中图分类号] B0-0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一斯芬克斯之问,构成了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元问题。自古希腊哲人发出“认识你自己”的箴言,至启蒙运动将“理性”与“自由”奉为人类的本性,思想家们始终致力于探寻一种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人性”实体,并以此作为构建其伦理、政治与社会理论的终极基石。这种源远流长的理论范式,可被统称为“抽象人性论”。然而,十九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以其石破天惊的哲学革命,对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发起了最为彻底的挑战。在其标志性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他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通常被视作马克思与一切旧哲学决裂的宣言,也成为其批判抽象人性论的集中体现。然而,流俗的见解往往将这一批判简化为对“人性”概念的彻底抛弃,似乎马克思的学说只关乎冷峻的“社会结构”与“经济规律”,而将活生生的“人”湮没于其中。这种解读是片面且有害的,它严重遮蔽了马克思批判的辩证性与建构性内核。正如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陈先达所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关键在于其“存在论性质的变革”,这一变革同样深刻地体现在其对“人”的理解上。马克思的锋芒所向,并非“人性”问题本身,而是旧哲学探究该问题时所依赖的非历史的、抽象的思维方式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幻象。他的真正目标,是在瓦解旧地基的同时,为理解“人”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

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因此,本文旨在对马克思的批判进行一种“再理解”。我们将论证,这一批判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方法论革命,其精髓在于实现了三大根本性转向:从对人性“是什么”的静态追问,转向对人性“如何历史性生成”的动态考察;从将人性视为个体“内在属性”的集合,转向将其界定为“社会关系总和”的外部性建构;从将人性作为理论“思辨的起点”,转向将其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通过这场革命,马克思不仅犀利地解构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话,更为我们提供了在具体、动态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把握“现实的人”的锐利视角。

一、抽象人性论的传统形态

要深刻把握马克思批判的革命性,必先清晰界定其批判的对象。抽象人性论并非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共享着核心理论预设的哲学家族谱系,其典型形态主要汇聚于启蒙运动及其思想后裔中。

(一) 启蒙理性主义的抽象“理性人”

以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将“理性”提升为人的本质规定。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了思维主体的绝对优先性,将人等同于一个纯粹的思想实体。康德进一步将这种先验理性提升为道德律令的立法者与遵从者,构建了一个剥离了所有具体经验内容(如情感、欲望、历史境遇)的、形式化的理性主体,并以此作为其全部哲学的基石。这种“理性人”假设,虽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却因其极端的抽象性与形式性,使得“人”成为一个苍白

而空洞的哲学范畴。

(二)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子化“经济人”

与理性主义遥相呼应,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经验论传统出发,塑造了另一幅抽象人性图景。斯密在其奠基之作《国富论》中,将“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以及“自利心”视为驱动社会经济活动的永恒不变的人性基石。这种“经济人”模型,预设了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孤立的原子式个体。正如学者段忠桥所剖析的,这种人性的假设本质上是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它巧妙地将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下的特定行为模式,论证为符合永恒自然秩序的、普适的人性表现,从而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合法性辩护。

(三) 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感性“类本质”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进程中,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是一个关键性的过渡人物与批判靶标。费尔巴哈以犀利的笔触颠覆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试图将哲学重新奠基于感性的“人”本身。然而,他的“人”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抽象。他将人的本质理解作为一种“类本质”,即一种把每个人自然连接起来的普遍共性,诸如理性、意志和爱。费尔巴哈的“人”,是抽离了一切历史维度和现实社会关系的、仅凭“感性直观”即可把握的生物学存在。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而完全无法理解,现实的人是在能动的、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才得以确证其存在的。我国哲学家孙伯鍈先生对此有精辟论断,他指出费尔巴哈尽管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位,但其人学观仍停滞于“直观的唯物主义”水准,未能触及社会历史的本质性维度。

综览上述形态,尽管其理论侧重各异,但都共享着同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它们无一例外地将特定历史阶段(尤其是资产阶级社会崛起过程中)所形成的人的特定思维模式、情感结构与行为方式,从其得以产生和维系的具体社会历史母体中剥离出来,并将其非历史化、永恒化与普遍化,从而炮制出一个关于“人”的宏大意识形态神话。马克思的毕生工作之一,便是要彻底戳穿这一神话,并在其废墟之上,建立起一套以历史性与实践性为根本特征的、全新的“人学”理论体系。

二、马克思批判抽象人性论的三重递进

马克思对抽象人性论的批判,绝非零敲碎打的指责,而是一场系统的、植根于其新世界观基础的总体性方法论清算。这一批判可以从以下三个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的维度予以把握。

(一) 方法论革命:从“静态的抽象”到“历史的生成”

此为马克思批判中最具颠覆性的维度。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在人性问题上都深陷于非历史的形而上学困境。它们执着于追问“人的本质是什么”,并企图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答案。马克思则彻底扭转了问题的提法。他不再关心那个先验的、既成的“抽象人”,而是毅然转向探究“现实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何被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地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宗明义:“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在此,“现实的人”首先被锚定于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与持续的“活动”之中。这些条件本身并非自然天成,而是前人实践活动的历史性积淀。因此,人性绝非某种先验的“给定物”,而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生成”的过程。奴隶主与奴隶、封建领主与农奴、资本家与无产者,他们迥异的人格特质、心理结构与价值观念,并非源自某个永恒的“人性模板”,而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特定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结构中的特定位置以及每日进行的特定实践活动所共同塑造的。正如马克思精辟指出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一个在流水线上重复单一操作的现代工人,与一个在土地上依据节气耕作的传统农民,或一个在全球资本市场中进行复杂投机交易的金融家,他们的感知方式、思维逻辑、欲望对象乃至情感体验都截然不同。这种差异,绝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其内在的、先验的“人性”不同,而必须历史地追溯至他们各自所嵌入的、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与实践形式。正如学者吴晓明所强调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深远意义,正体现在这种将事物、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的存在论视域转换之中。马克思的不朽功绩,在于他将人性问题彻底地历史化了,使其从一个形而上学的思辨课题,转变为一个必须置于具体社会形态中加以实证考察的动态历史课题。

(二) 存在论翻转:从“内在的规定”到“社会关系的总和”

《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

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是马克思人性观的核心命题,它实现了存在论层面上的根本性翻转。“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概念,彻底瓦解了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个体内在固有属性的传统观念。“抽象人性论”通常从鲁滨逊式的、孤立的个人出发,认为人的本质是内嵌于每个个体之中的某种属性(理性、自私、情感等),社会不过是这些已然完备的个体基于其内在本性(如通过社会契约)而外在地联合起来的产物。马克思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看似自然的“孤立的个人”,本身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是一种深刻的“错觉”。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此处的“社会关系”,其基础与核心是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客观经济关系。奠基于生产关系之上,并与之相互交织的,还有政治关系、法律关系、宗族关系、文化关系等,它们共同编织成一张具体个人生存于其中的、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之网,从根本上塑造着他的意识、他的需求、他的生活方式乃至其全部世界图景。一个人成为资本家,并非因其天生具备资本家的“基因”或“企业家精神”,而是因为他身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位置,即生产资料占有者的位置;一个人沦为无产者,同样是因为他在这一关系网络中,除了自身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因此,绝不存在一个能够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纯粹的人”。我们只能在奴隶与奴隶主、地主与农奴、资本家与工人的具体关系中,才能真正理解这些社会角色及其承载的特定“人性”。正如俞吾金教授深刻指出的:“马克思从来不谈论一种与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相分离的、抽象的、孤立的人的本质。”马克思将人的本质锚定于“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对人的理解必须实现从内在性心理学到外部性社会学、从个体主义方法论到关系性方法论的范式转换。学者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中,通过对经济学手稿的深层解读,揭示了这一关系性视角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同构性。

(三)意识形态批判:揭露“永恒人性”背后的权力关系

马克思的批判,从来不只是书斋里的哲学辩论,更是一种指向现实、充满张力的意识形态批判。在他那里,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哲学清算与革命实践始终内在勾连。抽象人性论绝非一个纯粹的学术误会,它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角色,即为现存的统治秩序与剥削关系提供

辩护,并将其永恒化与自然化。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时,曾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等普遍人性旗帜,这在当时具有毋庸置疑的革命性与进步性。然而,一旦资产阶级夺取并巩固了政权,这些抽象观念便迅速蜕变为维护其阶级统治的工具。例如,将“自私”“趋利避害”定义为永恒人性,巧妙地将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与剥削关系描绘成合乎人性、天经地义的“自然秩序”;将“自由”狭隘地界定为市场中的契约自由,则有效地掩盖了无产者因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被迫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的实质上的不自由与深刻不平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有着透辟的揭露:“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抽象人性论,正是这种“普遍性形式”最为集中的体现。它将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与特定人性观,精心伪装成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普遍人性,从而系统地麻痹被压迫阶级的阶级意识,阻碍他们认清自身真实的生存处境与历史使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再现’”,而抽象人性论无疑是这种“想象关系”的绝佳范本。它诱使人们相信,自己所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是源于某种永恒不变的人性,而非特定历史条件下可被改变的社会建构,从而在无形中消解了人们进行社会历史变革的意愿与潜能。马克思的批判,其政治锋芒正在于戳穿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象,奋力揭示出在“永恒人性”的温情面纱背后,所隐藏的那个暂时的、可变的,因而也是可以被超越的阶级结构与权力关系。

三、建构之维: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现实的人”

在完成了对抽象人性论的彻底解构之后,马克思并未留下一个关于“人”的理论废墟。恰恰相反,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上,正面建构起一幅关于“现实的人”的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图景。这个人,既非唯心主义的精神幽灵,亦非旧唯物主义的感性肉体,更不是费尔巴哈式的“爱”的宗教载体。

(一)核心基点:“现实的人”作为“感性活动”的存在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便划清了与一切旧哲学的界限:“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

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此处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特别是物质生产劳动,构成了理解“现实的人”的绝对核心。人首先无疑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有着吃、喝、住、穿等自然需求,这是任何历史观都必须承认的前提。然而,人与动物的种差之别在于,人并非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是通过自身的劳动实践,能动地、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在自然物上打下自身意志的烙印,从而创造出属人的“人化自然”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正是在这种改造外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人同时也改变着自身,发展着自身的各种本质力量,确证着自己的类存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因此,“现实的人”本质上是从事着“感性活动”的、历史性的、实践的存在。他的需要、他的感官、他的意识、他的社会关系,无一不是在持续不断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发展并变化的。尽管马克思在后来的理论发展中,更多使用“社会关系的总和”来界定人的现实性,但“实践”始终是这些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维系与变革的终极动源。正如学者王南湜所言,在马克思哲学中,“实践”是“说明人的存在及其历史的统一原理”。

(二)历史展开:人的需要与潜能的无限可能性

在抽象人性论的框架内,人的需要(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往往被视为一成不变的常量。马克思则认为,人的需要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它随着生产实践的广度和深度而不断地丰富、发展和演变。“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从原始人单纯的生存需要,到现代人产生的对艺术、科学、社会交往等复杂而高级的需要,这些需要本身的演进史,正是人性丰富性与历史性的生动刻度。同理,人的潜能也绝非预先封装在个体内部的固定程序,而是在人类历史实践的漫长进程中,通过社会总体的实践活动而渐次展开和实现的。在存在着分工与私有制的阶级社会里,人的发展注定是片面的、畸形的。“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工人被异化为机器的附属品,其丰富多彩的潜能被无情地压抑和窄化。而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正是建立在对人性这种历史性与生成性的全新理解之上。它被定

义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绝非意味着要实现某种预设的、完美无缺的人性模型,其真谛在于创造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为人的各种潜能的无限丰富与全面发展提供最根本的社会条件。在此视野下,人性不再是一个需要返回的、已然失落的天堂,而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需要在历史实践中不懈开创的无限可能。

四、结论

对马克思批判抽象人性论进行深入的“再理解”,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这绝非一个尘封于思想史档案馆中的陈旧公案,而是一个持续向我们时代敞开、充满蓬勃生命力的思想富矿。马克思的真正伟大,不在于他为“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古老问题提供了又一个言之凿凿的、新的形而上学答案,而在于他彻底革新了我们提出该问题以及思考“人”本身的方式。他教导我们,绝不能将人从其鲜活的历史语境与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抽离出来,进行一种孤立的、静态的审视。人不是一座自足的孤岛,而是广阔坚实大陆的一部分;人的全部奥秘,并不深藏于个体内在的幽深之处,而是铭写于人类共同创造的历史与实践的宏伟画卷之上。在他那里,人性从一个静止的名词(一个已然完成的物),转变为一个动态的动词(一个持续生成的过程);从一个理论思辨的起点,转变为一项现实实践的目标。通过从“静态抽象”到“历史生成”、从“内在规定”到“关系总和”、从“思辨起点”到“实践产物”这三重根本性的哲学飞跃,马克思完成了一场真正的“哥白尼式革命”。这场革命,既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哲学基础的犀利解构,也是对人类解放之路的深刻探索。它雄辩地昭示我们:要真正认识人,就必须去深入研究具体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而要最终改变人,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就必须去革命性地变革那些塑造着人的、现实的、客观的社会关系。在当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各种新的抽象化与本质化思潮沉浮泛起的时代,马克思的这一批判,依然是我们用以辨析迷思、坚守历史与辩证视野,并朝着那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不懈奋斗的、最为宝贵的思想罗盘与理论武器。

参考文献:

- [1]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A].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4]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5]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8]吴晓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0]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11]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2]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3]王南湜.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14]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5]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Reinterpreting Karl Marx's Critique of Abstract Humanism

WANG Yi-han

(Marxism School,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go beyond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that simply reduces Karl Marx's critique of abstract humanism to the negation of "human essence", and instead delves into the profou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and constructive dimensions of his critiqu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re of Karl Marx's critique lies in a fundamental methodological revolution, achieving three leaps: from "static abstraction" to "historical generation", from "inner determination" to "sum of relations", and from "speculative starting point" to "practical product". This critique not only exposes abstract humanism as a bourgeois ideology that conservatively keeps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but also, on the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structs a new concept of humanity centered on "real people" and their "sensuous activities".

Key words: Karl Marx; abstract humanism; human nature; practi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deological critique